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赵洪丹

（吉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分别以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代表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存在“U”型关系，而与农村金融外流存在倒“U”型关系；农村市场化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以及抑制农村金融外流，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为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差异化的政府支出政策，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同时，应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关注经济开放和汇率波动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负向效应。

关键词：农村金融；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6－0010－08

一切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政府和市场互相作用的结果[1]。政府和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被学者们广泛讨论[1－7]。其中，张杰和谢晓雪[4]认为，理解金融发展“中国模式”的要害是剖析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过程的博弈与磨合。进一步的，马勇和陈雨露[7]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边界，而有效边界则取决于“国家禀赋”特征。可见，政府和市场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动力。

农村金融是整体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亦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已有关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文献对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某一方面，例如农村资金供求[8]、农村金融排斥[9－10]、农村金融制度效率[11]、农村金融负投资[12]等，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如何使农村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而很少关注农村金融自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鲜有文献讨论政府和市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着重讨论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目的在于揭示政府和市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效果以及作用机制，为制定和实施农村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所构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金融发展，解释变量包括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和一组控制变量，建立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如下：

$$\mathrm{Fin}_{it} = c + \beta \mathrm{Gov}_{it-1} + \gamma \mathrm{Market}_{it-1} + \sum \varphi_k X_{kit-1} + \alph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收稿日期：2016－07－1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6.00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50)；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107)

作者简介：赵洪丹(1980—)，男，黑龙江依兰人，吉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E-mail：zhaohongdan2013@163.com

在式中,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k 是控制变量的序数,α_i 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定效应,δ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_{it} 表示与解释变量无关的随机变量;Fin 代表被解释变量农村金融发展;Gov 和 Market 分别代表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为了避免遗漏重要变量,我们选取了一组控制变量,用 X 代表;β、γ 和 φ_k 分别是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和相应控制变量的系数。为了减缓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我们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引入计量模型。按照计量经济学理论,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不会影响前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因此会显著降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为了避免因为衡量指标单一而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本文采用 4 个指标予以衡量,目的是从多个角度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保证分析更为科学和全面,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 4 个指标分别是农村人均金融资产(Fin_Asset)、农村人均贷款(Fin_Loan)、农村金融外流(Fin_Out)和农村金融风险(Fin_Risk)。

(1)农村人均金融资产(Fin_Asset)。由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之和除以乡村人口表示。农村存款包括农业存款和农户储蓄存款,农村贷款由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构成。存款和贷款是农村最重要的金融需求,也是农村金融机构所供给的最主要的金融服务,因此由农村存款和农村贷款所构成的农村人均金融资产指标基本涵盖了农村金融的需求和供给,可以较好地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人均金融资产越多,说明农村所获得的金融服务越多,农村金融发展状况越好。

(2)农村人均贷款(Fin_Loan)。计算方法是用农村贷款除以乡村人口。信贷是金融机构向农村提供资金的主要方式,农村人均贷款可以较好地度量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因此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理想指标之一。农村人均贷款指标越大,即表明农村信贷供给越充足,农村信贷可得性越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3)农村金融外流(Fin_Out)。由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之差除以乡村人口表示。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其资金外流主要是通过农村金融机构渠道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将从农村吸收存款放贷到非农领域或者循环于金融体系内部,造成农村资金流出。农村人均存贷差越大,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资金流出问题越严重,因此农村人均存贷差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负向指标。

(4)农村金融风险(Fin_Risk)。直接使用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表示。由于信息不对称、非生产性借贷、单笔贷款数额少而且需求分散等,农村金融市场风险较高。农村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农村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羁绊,应该予以关注。农村不良贷款率可以直观地反映农村金融市场蕴含的风险,因此可以用于衡量农村金融发展质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构建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外流的指标过程中,使用的是农村人口平减,这一点不同于有关文献所使用的农村 GDP 平减。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发展农村普惠制金融的原则下,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方向,相比于农村 GDP 平减,农村人口平减能够包含更多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信息,并可以剔除各省份人口差异的影响;第二,农村 GDP 数据并不能直接获得,只能采用替代数据,而农村人口数据可直接获得,根据其所构建的指标更加可靠[13]。

2. 核心解释变量

(1)政府支出(Gov)。借鉴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4]、陆铭和陈钊[15]的做法,使用各省份的财政支出扣除教育和国防支出部分与 GDP 的比率表示。政府支出增加,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16-17],造成金融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但是,当政府支出增加到一定程

度,也可能具有挤入效应[18-20],从而增加农村投资。因此,我们推断政府支出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

(2)农村市场化(Market)。由私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与乡村从业人员之比表示。使用劳动力从业结构指标衡量市场化进程是已有文献的惯用做法[21-22]。在中国,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23],促进了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农村市场化程度。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引致了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因此,我们认为农村市场化是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有利因素。

3. 控制变量

(1)农村人均纯收入(Income)。使用各省份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被2005年的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实际变量表示,用于代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必然要受制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金融需求,进而引致农村金融供给,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在理论上,农村经济发展不同于农村经济增长,发展侧重于质量,而增长侧重数量。相比于农村GDP,农村人均收入更能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另外,农村GDP数据不像农村人均收入数据可以直接获得也是我们考虑的因素。我们预期Income的系数符号为正。

(2)经济开放程度(Trade)。用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与该省份GDP的比率表示。毋庸置疑,经济开放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经济开放必然会显著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然而,对外开放部门大多存在于城市和非农产业,在中国二元经济制度结构下,经济开放可能会导致金融资源从农业和农村流向工业和城市,从而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因此本文预期Trade的系数符号为负。

(3)汇率水平(Rate)。使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表示。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的农村金融不可能置身事外,必定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汇率波动是对这种冲击最直接的反映。汇率下降(在直接标价法下表现为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入。近些年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过剩的资本可能会溢出到农村,从而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足。因此,汇率下降可能会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汇率是反向指标,我们推测Rate的系数符号为负。

(三)数据来源

农村金融统计数据往往因为残缺不全而且统计口径不尽一致,给实证研究造成诸多不便。有关研究常使用推算或加总的方法来构建数据库,这就造成了数据选取主观因素较大,降低了数据的真实可信度。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银监局发布的《农村金融图集》统计的2006年至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该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数据相对比较完整,且来自权威部门统计,真实可信。西藏的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我们构建了30个省份从2006年至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共150个样本。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区域的划分,将30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份(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1个省份(市):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二、政府和市场对农村人均金融资产的影响

本文首先以农村人均金融资产(Fin_Asset)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检验变量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通过依次添加自变量的方法,观察各自变量的系数在不同模型中的数值及显著性水平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或者变化较小,则有理由认为该自变量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是稳健的,否则是不稳健的。我们最关心的变量是政府支出和农村市场化,根据理论分析认为政府支出

可能对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引入政府支出的平方项进行分析。实证检验结果包含在表 1 的 4 个方程中。方程(1)的解释变量包括政府支出、农村市场化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在这一估计结果中,政府支出变量并不显著;农村市场化和农村人均纯收入都如理论所推断的那样有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在方程(1)中的政府支出项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我们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支出的平方项,并得到了方程(2)。与方程(1)相比,方程(2)中农村市场化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系数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了近 0.03。同时,在加入了政府支出的平方项后,政府支出变量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支出对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进一步地,我们在方程(2)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开放变量 Trade,得到方程(3)。估计结果显示 Trade 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理论预期一致,也就是说,经济开放导致金融资源从农业和农村流出到贸易部门,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定对外开放的证据,而应视为在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彻底改变的制度条件下,经济开放所造成的金融资源城乡配置的扭曲,这反映了中国农村开放度还不够、城乡融合程度还不高的现实。在加入了经济开放变量后,政府支出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农村市场化及农村人均纯收入变量的系数并未有明显的变化。

表 1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Fin_Asset 为因变量)

变量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政府支出(Gov)	0.009(0.018)	-0.187***(0.062)	-0.231***(0.063)	-0.188***(0.063)
政府支出平方(Govsq)		0.426***(0.128)	0.494***(0.129)	0.467***(0.125)
农村市场化(Market)	0.060***(0.012)	0.058***(0.012)	0.054***(0.012)	0.049***(0.011)
农村人均纯收入(Income)	0.009***(0.001)	0.010***(0.001)	0.012***(0.001)	0.015***(0.001)
经济开放(Trade)			-0.015**(0.006)	-0.015**(0.006)
汇率(Rate)				0.004***(0.001)
常数项	-0.030***(0.003)	-0.017***(0.005)	-0.015***(0.005)	-0.063***(0.016)
Hausman 检验值	21.74	31.76	34.39	49.12
调整 R^2	0.677	0.703	0.713	0.733
F 检验值	114.9	96.29	80.99	73.99
观测值	150	150	150	150

注:①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确定 4 个方程均为固定效应;②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下同。

在方程(3)的基础上,我们添加了汇率变量(Rate),得到方程(4)。结果显示 Rate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相反,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这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流入及其预期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在正反馈机制下,人民币升值的现实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促使更多的外资流入,并推动人民币继续升值。本来资本的流入可以溢出至中国的农村,弥补农村发展的资金不足,成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积极因素。然而,中国至今仍然处于明显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二元金融结构并非是城乡金融市场的完全隔离,而是表现为农村金融向城市金融的单向转移。农村的金融资源通过遍布于农村的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渠道被输送到城市,而

受到农村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小农户的耕作方式及农民不完全的财政权利等因素的制约,适合于城市的金融资源很难通过金融系统配置到农村。由人民币升值而引起的外资流入必然会增加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这些增加的货币供给大都存在于城市而非农村,推高了城市资产的价格,特别是房屋和股票的价格,城市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带动资金收益率的上升,这就会吸引原本已经存在于农业和农村的金融资源转而投资于城市的相关产业,而农村金融发展则面临资金匮乏的窘境。方程(4)与方程(2)和方程(3)相比,在添加了汇率变量后,其他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在表1的4个方程中,农村市场化变量始终在1%的水平上正显著,说明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积极而稳健的作用。农村市场化将促生多元的农村经济主体,形成多元的农村金融需求。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商业性金融自发地进驻农村金融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农村内生金融机构也将在市场化的带动下得以发展,有助于形成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金融机构覆盖不同层次的客户群体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农村市场化不仅会引致金融需求,而且还会促进农村社会的信用体系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只有守信用,才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在市场中才会形成信誉。农村市场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信用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转变。完善的信用体系是农村金融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包括农村市场化改革在内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不仅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还催生了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因此,通过农村市场化来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进而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发展是一条可行的政策路径。

现在我们聚焦于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支出。表1清晰显示,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方程(4)中,转折的临界点大约在 Gov = 0.201 处,大于该临界值的样本共25个,约占全部样本的16.67%。这表明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先是减少,然后增加。其基本逻辑是:当政府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干预较少,这有利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促使农村经济增长较快,从而增加了农村人均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此时的经济情况处于政府作用小,市场作用大的状态,或者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大市场。当政府支出从较低水平开始增加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逐渐增加,可能限制了市场功能的发挥,而此时因为政府支出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区间,政府的管制和干预不能替代其所限制的市场作用,致使政府和市场的双缺位,造成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和农村人均金融资产降低的局面。当政府支出达到较高水平区间后,政府支出增加虽然加大了对经济管制和干预的力度,但是由于政府支出足够多,以至于替代了市场功能,政府作用不仅没有缺位,而且还弥补了市场作用的不足,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增长,此时的经济情况是政府作用十分强大,而市场作用较小,即大政府小市场。

三、政府和市场对农村人均贷款、农村金融外流和农村金融风险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确保分析的稳健性,我们分别以农村金融发展的另外3个指标——农村人均贷款、农村金融外流和农村金融风险——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见表2。

方程(5)显示,各个解释变量对于农村人均贷款的影响与方程(4)中对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的影响基本一致。政府支出作用仍然表现为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即当政府支出水平较低时,政府支出有减低农村人均贷款的作用;当政府支出水平较高时,政府支出有增加农村人均贷款的作用。有趣的是,政府支出作用由负转正的临界值是0.203,与前文政府支出作用的临界值0.201大体相当。农村市场化变量正显著,说明农村市场化具有增加农村人均贷款的作用。农村人均纯收入和汇率对于农村人均贷款的作用都显著为正,说明农民收入增加和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均

贷款水平。经济开放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在现有制度结构下,日益提高的对外贸易开放水平抑制了农村人均贷款的增加。

表 2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Fin_Loan、Fin_Out、Fin_Risk 为因变量)

变量	农村人均贷款(Fin_Loan)	农村金融外流(Fin_Out)	农村金融风险(Fin_Risk)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政府支出(Gov)	-0.164*** (0.058)	0.150*** (0.055)	-0.097* (0.052)
政府支出平方(Govsq)	0.403*** (0.116)	-0.357*** (0.111)	0.202* (0.106)
农村市场化(Market)	0.036*** (0.010)	-0.023** (0.010)	0.022** (0.010)
农村人均纯收入(Income)	0.012*** (0.001)	-0.009*** (0.001)	0.002(0.001)
经济开放(Trade)	-0.017*** (0.006)	0.020*** (0.005)	0.009* (0.005)
汇率(Rate)	0.004*** (0.001)	-0.003*** (0.001)	0.010*** (0.001)
常数项	-0.054*** (0.015)	0.043*** (0.015)	-0.068*** (0.014)
Hausman 检验值	23.13	34.88	29
调整 R^2	0.621	0.38	0.681
F 检验值	46.51	21.05	58.92
观测值	150	150	150

注: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确定 3 个方程均为固定效应。

方程(6)表示的是各个解释变量对于农村金融外流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于农村金融外流的作用先正后负,具有显著的倒“U”型特征,临界值为 0.210。这说明当政府支出水平较低时,政府支出扩大了农村人均存贷差,增加了农村资金外流;当政府支出水平较高时,政府支出缩小了农村人均存贷差,减少了农村资金外流。政府支出与农村金融外流呈倒“U”型关系,恰好与政府支出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的“U”型关系的逻辑完全一致。当政府支出处于较低水平区间时,经济情况处于小政府大市场的状态,市场功能发挥的比较好,如果此时政府支出增加,即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增加,则势必会阻碍市场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收益的降低,造成农村资金外流,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减少。当政府支出处在较高的水平区间时,经济处于大政府小市场的状态下,市场功能虽然受到限制,但是由于政府支出足够多,完全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引导和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于农村,并减少农村内部资金的外流,有利于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的增加。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外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农村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农村金融外流就越少。这意味着提高农村市场化进程有助于减少农村资金的外流。这是因为农村市场化增强了农村经济主体的活力,繁荣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收益水平,有利于吸引资金投资于农业和农村。农村人均纯收入会降低农村金融外流水平,这是因为收入增加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较好,有利于吸引资金投资于农村,另外,收入增加提高了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增加了农村金融需求,进而促进了农村贷款的增加。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会加剧农村金融外流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对外开放部门具有较高的利润,吸引了大量农村资金,使农村资金流出农村,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不利于对外贸易部门的资金流入到农村,这就造成了经济开放对于农村金融外流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具有抑制农村资金外流的作用,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或许不利于农村金融发展。

方程(7)的因变量是代表农村金融风险的农村不良贷款率,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支出对于农村

不良贷款率的作用表现为"U"型特征,即先是负向作用,然后是正向作用,临界值为0.240。当政府支出处于较低水平时,政府支出有利于降低农村不良贷款率;当政府支出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支出将会增加农村不良贷款率。这可能是因为,当政府支出水平较低时,政府支出可以部分地弥补市场的不足,且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少,有利于金融机构配置风险资产,从而降低了农村不良贷款率水平。随着政府支出水平的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来越深,农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结果造成农村不良贷款率上升。因此,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要注意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农村不良贷款率。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加大效应。农村市场化活跃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收益水平,根据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经济学原理,农村金融风险会随之增大。这提示我们,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要注意防范农村金融风险。农村人均纯收入变量系数符号为正,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农村收入增加说明农村经济发展较好,进而农村贷款数量增加,但在贷款质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可能使农村不良贷款率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收入增加提高了农民偿还贷款的能力,可能使农村不良贷款率下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农村人均纯收入对于农村不良贷款率的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提高经济开放程度和汇率水平(人民币贬值)将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显著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政府支出表现为非线性作用,而农村市场化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低于20% ~25%区间时,政府支出对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具有负向效应,对农村金融外流具有正向效应;而当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高于20% ~25%区间时,政府支出则表现为相反的效应。农村市场化对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金融风险具有正向效应,对农村金融外流具有负向效应。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正向效应,经济开放和汇率波动会增加农村金融风险。

研究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即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可以从合理确定政府支出水平和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入手。在政府支出方面,根据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存在非线性作用,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把握政府支出的度。在农村市场化方面,政府应该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并以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农村金融发展的良好信用环境,同时,应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关注经济开放和汇率波动对农村金融发展的负向效应。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经济研究,2014,(1):16 -19.
[2]周业安.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53 -59.
[3]李义奇.金融发展与政府退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5,(3):88 -99.
[4]张杰,谢晓雪.政府的市场增进功能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模式"[J].金融研究,2008,(11):171 -180.
[5]张志元,马雷.经济金融发展视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再定位[J].改革,2014,(1):25 -32.
[6]刘文革,周文召,仲深,等.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J].经济学家,2014,(3):64 -73.
[7]马勇,陈雨露.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禀赋"与有效边界[J].财贸经济,2014,(3):49 -58.
[8]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2):16 -155.
[9]高沛星,王修华.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4):93 -102.

[10]董晓林,徐虹.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分布的视角[J]. 金融研究,2012,(9):115 - 126.
[11]冉光和,赵倩.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效率的测度及其空间差异研究[J]. 农村经济,2012,(1):3 - 6.
[12]王曙光,李冰冰. 农村金融负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效应的经验验证与矫正框架[J]. 财贸经济,2013,(2):59 - 67.
[13]丁志国,张洋,高启然.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因素识别[J]. 中国农村经济,2014,(3):4 - 13.
[14]罗伯特·J. 巴罗,夏威尔·萨拉—伊—马丁. 经济增长[M]. 夏俊,译. 2 版.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15]陆铭,陈钊.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6]BAILEY M J.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price level[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17]BARRO R J.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82(6): 1095 - 1117.
[18]FELDSTEIN M. Government deficits and aggregate demand[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2, 9(1): 1 - 20.
[19]KARRAS G.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4,26(1): 9 - 22.
[20]HJEIM G. Is private consumption growth higher (lower) during periods of fiscal contractions (expansions)?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2, 24(1): 17 - 39.
[21]习近平. 论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测度[J]. 经济学动态,2001,(11):11 - 17.
[22]樊纲,王小鲁,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2011,(9):4 - 16.
[23]李克强.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J]. 中国社会科学,1991,(3):65 - 82.

Government Spending, Rural Marketization and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ZHAO Hong-dan
(*Economic Colleg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rural marketization to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factors,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factor and market factor on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esents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come difference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rural per capita, and rural per capita loans and financial assets show a "U" typ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ial risk, and rural financial flows show an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Rural marketization help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per capita and rural per capita financial assets loan, but may inhibit the rural financial flows at the same time, while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a rural finance. Policy makers should adopt differentia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policy, accelerate reform of the rural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level,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ural marketization; financial risk